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創系十週年叢書總序 i

第一章

緒論：人物、機構、空間

- 8 一、文化香港，書寫傳奇
- 13 二、與「文」同在，存茲墜緒
- 17 三、郁郁乎文，融合新舊與中西
- 25 四、「文」在香港，情依中國

第二章

**區區小島，海濱鄒魯：
宋王臺文化空間的建立**

- 36 一、重新進入歷史視野的「宋王臺」
- 43 二、抗戰時期眾相遊覽的「宋王臺」文化景觀
- 52 三、「宋皇臺公園」與戰後文化景觀的重建
- 62 四、結語

第三章

被忽略的舊學旗手： 李景康的文教之功與文白取態

- 67 一、李景康：值得多加關注的嶺南教育家
- 70 二、李景康的教育事業
- 82 三、文白之用：以保存國粹為原則
- 89 四、結語

第四章

與時俱變，無關新舊： 華商總會領袖對「五四」的迎拒

- 95 一、華商領袖對五四的態度：1919—1925
- 102 二、華商領袖對五四的態度：1926—1928
- 110 三、華商領袖對五四的態度：1929—1935
- 118 四、結語

第五章

新舊共存、各適其適： 胡適訪港的迴響與文化意義

- 124 一、胡適訪港：行程與交際網絡
- 130 二、香港政商界對胡適的觀感
- 137 三、胡適訪港的迴響與意義
- 145 四、結語

第六章

自生自滅的文教事業： 香港私專院校的創建與轉型

- 152 一、「手空空，無一物」：私專的創建與限制
- 162 二、一所以收編私專的新大學的成立
- 170 三、私專的式微
- 175 四、結語

緒論：
人物、
空間、
機構

第七章

花果飄零，靈根難植：
唐君毅對香港高等教育的批判

- 180 一、香港辦學之難：港府的政治控制
184 二、面對收編：教育理想與現實局限
187 三、喚醒民族國家意識的教育：
對大學「地方化」、「國際化」的批判
193 四、缺乏文化主體性 ——
「中西文化邊緣地帶的教育」
201 五、結語

第八章

結論 203

後記 213

過去曾有人說，香港是一本難以讀懂的书。既然難懂，那對於成長於這片土地的人而言，便有義務盡其所能，慢慢說好香港這本书的故事了。

或許，也斯曾經告訴我們的一個讀懂香港故事的方法，值得大家參考：

到底該怎樣說香港的故事？每個人都
在說，說一個不同的故事。到頭來，我們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
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
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
甚麼位置說話。¹

的確，不同人在講述香港故事的時候都會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素材來講述他們所知道的内容。對於一位不擅長於講故事的文史研究者而言，要克服學究式的口吻與文字鋪陳，也是一個挑戰。本書嘗試以香港文化歷史中的人事為中心，讓他／它們走出書堆，面向普羅大眾。大家可藉此了解曾在香港留下足跡、為香港作出貢獻的一些人物及其經歷。他們主要是一群曾積極面向香港社會，並留下文化創造功勞的教育家、思想家、學術領袖乃至紳商領袖。這些人物賴以實現理想的機構、場所或地方（place），有些在今天已經成為香港這座城市的文化景觀。藉着重溫書中人物的生平事跡與文化教育活動，我們得以走進城市記憶的隧道，觸摸城市的肌理，感受舊日社會跳動的脈搏，尋味一座城市的故事底蘊。

本書的撰寫，一方面以不同時期活躍於香港的人物作縱線論述，另一方面也透過人物在香港留下的文化足跡及他們所寄身的機構作為橫向鋪陳，從而展現香港多元面貌的文化空間與富歷史意義的景觀。

1 也斯：〈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收入朱耀偉、張美君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1。

一、文化香港，書寫傳奇

香港並非文化沙漠，而是個有文有質的奇特地方。

「文化香港」，可以寫作是「文『化』香港」。「文化」是一個包羅萬有的名詞，從社會制度、政治模式、典章律法、建築風格、美術工藝、風俗習慣、語言文字、學說思想、道德教化、宗教信仰乃至衣食住行、人倫日用等的表現形式，它們都體現了人類或某個族群的「文化」創造。文化的本身，並無高低之分。不同的族群或民族都有各適其適的文化形態或文化生產，而這往往與他們各自的生存條件、生活環境特點息息相關，進而構造出千姿百態的物質文化與內涵豐富的非物質文化。

本書實在無意細究何為文化，只是希望說明香港是有其千姿百態、多元而複雜的文化內涵。然而，文化不只是作為名詞來看待，它還可以視作為動態的，以「文」「化生」出新的價值意義的一組文字組合。

文化之「化」在中國的原初涵意，本身被賦予了生生不息的創生意義。諸如見於《周易·繫辭》、

《白虎通德論·嫁娶》、《列子·天瑞》的「萬物化生」的長養萬物、生演變化即是。同時，《周易·賁卦》所言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化」是人文化成、人文教化的意義；《孟子·盡心上》的「過化存神」也同樣有「感化」、「教化」的意味。那麼，本書的「文『化』」香港，也沾帶「教化」意味，並結合清季香港修文設教之風未興之際，特指知識精英自北而南興學施教的努力而言。早於英國佔據香港島之初，有識之士便在仍為清政府管轄的九龍寨城興建義塾，推動儒學，教化民眾。以下這副目前仍高掛於九龍寨城公園裏的原「龍津義學」門聯，便讓我們清楚看見早期在港知識精英「文『化』」香港的心願與抱負：

其猶龍乎？卜他年鯉化蛟騰，盡洗蠻煙蛋雨。

是知津也，願從此源尋流溯，平分蘇海韓潮。

由上可見，文「化」香港在近代香港歷史裏既是一個由無變有的人文教化興盛過程——「盡洗蠻煙



昔日龍津義學的一對門聯，可見於今天的九龍寨城公園，我們從中可見昔人「文『化』香港」的一片心跡。

蛋雨」，同時也是文「化」的目標——「平分蘇海韓潮」，而這更是清季有識之士對自身在地文化事業的高度期許。

香港本是遠離中國文化、政治中心的偏遠小島，它的城市化確實是從漁港、鹽田、養珠、伐木等勞力作業轉變至航運、輕工業、金融業的，但在這經濟產業發展演變的同時，香港的文化教育事業也同樣在不斷發展——老子猶龍、孔子知津；期待在地青年變化氣質、魚躍龍門，進而變夷為夏，更加溯源直上五千年，擔起傳續千年文脈正統之大任。那些因時變「遵海而南」（甚或因事流落香江）的有識之士，於香港被強行割讓之後的數年，便在龍津義學的大照壁髹上「海濱鄒魯」四個大字，亮出身份，展示建功立業的決心。他們藉着興學施教，造福一地之生民，移風易俗，使香港成為儒學興盛的文化之都，更以唐宋古文八大家自況、自喻——傲視蘇軾外放海南而建立的在地功勳，媲美韓愈外貶潮州而廣贏百姓稱譽。

由上觀之，文化之產生，必然是因為有人；有人便有興學施教的人文活動，甚至是因為中心的變動而

文教禮失求諸野的意外繼承，使文化遺產在這個曾經一度被視為化外之地的城市枝繁葉茂地生長，成為存學衛道以承續千年文脈的文化空間。

本書將要向讀者披示的，是從前清遺老賴際熙到革舊學之命的胡適、從努力進入香港政治體制以發揮影響力的華人紳商領袖，到不留情面地批判殖民管治的唐君毅，他們的文化信念、文化事業都將會在本書裏有所論述。縱然他們之間的政治立場各有不同，但他們在香港一域展現的不同思想歸趨與文化情懷反過來也有不少異中之同。

出於對中國文化的重視及對於中國何去何從的思考，不論新派舊派還是中外人士，在同一個地方的不同時段都有他們的不同感懷與理想，他們均希望在這個被稱作「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裏或實現政治抱負，或實現文化理想。全書共分八章，每章都涉及一個空間或機構場所，它們分別是宋王臺石刻／宋皇臺公園、華商總會、學海書樓、官立漢文中學、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香港私立專上院校；涉及的人物有金文泰、賴際熙、陳伯陶、周壽臣、陳君葆、李景康、胡適、唐君毅等。時

間跨度幾乎是整整一百年，而當中的場所、機構或建築物至今仍存在，有些甚至是繼續不斷、欣欣向榮地發展。

二、與「文」同在，存茲墜緒

沒有「文」，道的精神內涵因得不到講述而無所傳續。所謂「文」，本是用以描述無形之道的內容；如孔子「文不在茲乎」的「文」便是指禮樂制度。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向來多有闡釋「文」的本質，並往往將之與「道」合論。劉勰於《文心雕龍·原道》篇說：「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進而啟發韓愈、柳宗元等相繼提出「文以明道」、「文以載道」、「文以貫道」之論。直到朱熹，才再糾正「裂道與文以為兩物」之誤而啟發元人「文與道一」的觀念；後世甚至還有「文道合一」的衍生觀念。無論如何闡釋文、道關係，都是要說明它們二而為一，一而為二的關係，彼此相互體現天地間的大義，「文」或文章的要義，被古人視作「救世行道之具」，要「在社會與

道德重建中發揮作用」。²

「文」的含義及文與道的關係，本身是文學理論乃至理學、哲學的深層次問題，我們毋需在此花費太多筆墨深細探究。於本書而言，所要突顯的「文」與「道」意義，不外乎在港華人領袖與南來文化領袖如何看待中國文化與家國民族前景何去何從的問題，而這種熱衷守護中國傳統精神價值的心態，往往是在面對時勢轉變帶來的挑戰下才格外分明地呈現出來。那麼，面對時變與世變，時人如何在守護固有文化精神與思想價值不變之餘，回應時代的進步而「損益」其中的典章、禮儀、制度、儀文等等，藉以達至維繫社會秩序及促進家國民族向上發展的目的，這一切都值得深究。

「文」既是救世行道之具，有識之士以文會友，大集同志興學施教以成其事；同時，「文」的教化場所及其活動空間的創制與發展，也是用以觀察香港在

多變時局下社會人、事、物變化軌跡的深層視角，由此而展示一座城市的文化內涵。

在港紳商、南來文人，他們於不同時代來到香港，都有共通之處，便是身居邊陲之地而心懷家國，情有所牽，因而或化諸為文、或興學施教，各各守護自身執守之文化理念，藉以應對中國出現的各種政治與文化上的危機，冀能匡正人倫秩序而振興國運。他們大多都是在世變之中由中心走向邊緣的群體，甚至是退居至香港這座遠離政治、文化中心的「邊緣」城市中。但是，就是在這片邊緣區域裏，他們找到了新的天空，用以延續固有的人生職志、興學施教以燃點承傳中國傳統的希望。

自辛亥革命以來，正統皇權解體，固有思想體系崩潰，天下大變而道術亦隨之裂變，不少華人紳商領袖就是在輪番變局中紛紛南下。一些位據文教、文壇要津的前清翰林則更以不仕新朝、不食周粟為榮，以清室遺民自居，群集於香港這叢爾小島——紳商興學、翰林施教，守護道統，堅持固有文化精神價值。他們熱衷於光大歷代遺民志士之學，同時又致力於辭章文獻、禮儀秩序、規章制度等的考究之學，平時也

2 查洪德：〈論元代文論的「文與道一」說〉，《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33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17—248。

不忘籌辦雅集吟誦，特別是透過宋王臺這個文化空間而把感時憂國之情轉化為「文」，藉着詩、詞、文章乃至日常酬酢應對之文，把他們的家國之思及自身際遇抒發出來，同時也把他們的文化理想與尊孔崇古的在地社會文教建設緊緊地聯繫起來，讓香江文教成為延續中國千年道統或文脈的重要地方。

本書把那個無形之「道」——文化理想的實踐軌跡、創制過程放置於不同的人物、機構與建築物體上，希望從中讓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了解香港並不是甚麼所謂的「文化沙漠」；同時，也希望廣大讀者注意到，香港雖然在 1842 年因為英國船堅炮利的奪取而被迫接受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管治，但中國文化傳承在這逾百年裏不絕如縷。每逢國內變動，各種體現千年文脈的經史文教場所、民間文化組織便紛紛成立；甚至是各種宗教團體南下落戶香港，各因經濟財力或建宮殿祠宇、或進駐市井蝸居，不但是各色各樣，同時也是各適其所適，在英國殖民政府容許的有限空間裏繼宗立派。

三、郁郁乎文，融合新舊與中西

香港不過是區區的彈丸之地，然而，史籍上卻出現了兩座「聖山」，此等深有文化盛譽的稱號足以說明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這兩座聖山，分別是宋王臺石刻所在的那座已被日本軍隊及英國殖民政府夷平的小山丘。另一座聖山便是早見於明末《粵大記》記述的屯門青山。屯門青山因為曾是佛教名山而被敕封為聖山，其上之杯渡禪蹤更被譽為新安八景之一。青山蘊含的濃厚文化氛圍，是近百年來文人墨客甚至政要名流流連忘返之地。它較古的勝跡有相傳是韓愈留下的「高山第一」墨寶，較新的則有香港著名建築商伍華斥資建造的韓陵片石亭，亭內樹立了一塊紀念金文泰（Cecil Clementi）與本地紳商兩次登高遊覽青山的〈遊青山記〉石碑。就是這篇碑文，折射出香港的文化底色，既看見殖民管治者「以文為術」的管治手段，同時也看見華人領袖在中國軍閥混戰年代亟亟於在港開創人生事業、實踐理想的心態。當然，這同時也反映了香港是一個融合華洋不同種族及文化的地方。



香海名山牌樓橫匾上刻有「香海名山」，旁則刻有「香港總督金文泰題」八字。

更深刻反映香港華洋共處而中西薈萃的，毫無疑問是聳立在青山山腰的「香海名山」中式牌樓。牌樓由一眾香港華人紳商領袖聯署興建，其上銘刻有清遺老陳伯陶、伍銓萃及前民國總理梁士詒的楹聯，而「香海名山」四字旁則刻有「香港總督金文泰題」八字。在這片「香海」裏、在這座「名山」上，洋總督、前清遺老甚至被遺老視為敵國的民國政要，在變動時代裏構築牌樓，在中國其他地方恐怕也是異數了。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不單是牌樓上鑄刻楹聯的前清遺老與民國政要抒發家國民族之念，就是後來不少攀上青山的文人雅士，大多都是志不在於瀏覽風景，乃是北望中原，發思古之幽情。青山禪院裏守護大雄寶殿的韋陀亭，其正面有幅彌勒佛圖，刻有「才上宋皇臺遍尋杯渡石，曾經滄海水願度法身船」對聯。這種故國之思、黍離之悲，反過來正好反映了一代代南來者在中國政局動盪年代裏，不論處身何種境地都對於民族何去何從充滿眷念。一旦在青山登高遠眺，進入眼簾與心坎的，是綠野神州與千年文脈的「宋臺」景觀。